

艾芜 1904 年生, 1932 年开始发表作品, 其代表作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初版于 1935 年, 是典型的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作家; 许地山 1893 年生, 1921 年开始发表作品, 其代表作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初版于 1925 年, 是 20 世纪 20 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作家之一。二人时间上相隔十年, 又分属不同倾向的文学团体, 但某些因素却将他们的创作联系在一起, 使人可以从中发现其小说文本之间某种互文性, 或曰对话关系。这些因素就是其上述作品的异域色彩和对人生哲学的探讨。

艾芜和许地山一样，开始发表小说时都是28岁，《南行记》和《缀网劳蛛》结集出版时它们作者的年龄也相仿（艾芜31岁，许地山32岁），但他们各自的心态却有不同：艾芜《南行记》体现出的，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青年人不断探索进取的精神，许地山小说给人的感觉，却是历经沧桑、饱受忧患的人面对痛苦难以自拔时，精神上寻求解脱之道之中年心态。

许地山出生于台湾，幼年时因父亲反日活动而举家迁至大陆，经历了国家之痛。就在发表处女作《命名鸟》的前一年，其爱妻病逝于赴京途中，给其精神以重大打击。年龄尚在青年的他遂有了中年人的悲苦心志，认为“生本不乐”。他试图从宗教思想中寻求精神痛苦的解脱之道。所以，以缅甸为背景的《命名鸟》和以南洋为背景的《商人妇》《缀网劳蛛》都以妇女的悲剧命运为关注焦点，有的作品表现出消极避世的思想倾向。《命名鸟》中的缅甸女青年敏明面对爱情挫折看破红尘，感到人间爱情的反复无常。她认为纵然她已与加陵成眷属，也难保欢爱永在，于是最终选择了投海自尽。她厌世的原因，主要是为逃避终极意义上的人生之苦。《商人妇》《缀网劳蛛》里的主人公惜官与尚洁不再厌世轻生，她们不论是被丈夫抛弃虐待，还是被丈夫砍伤再度残疾，都选择顽强地活下去。许地山说他的创作是要为“唤醒国民求生底法螺”，“指导群众一条为生而奋斗而牺牲底道路”。惜官与尚洁不论是宗教教徒，都有教徒般的人生哲学：在前者是对于“苦”与“乐”的独特看法，即“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的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时是苦，回想时是乐。”在后者则是其“蜘蛛哲学”，她在“无论什么事情上头都用一种宗教的精神去安排”，不去管以后的命运、最终的结局，只是尽力而为，勤勉地去做当下应做的事，并从中寻找生命的价值与人生的乐趣。后来《春桃》里的主人公更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坚韧的生存意志和独特的人生态度。

不知道艾芜早年是否被许地山表现异域风光的小说所吸引。我们推测他看过许的作品,当非虚妄。据作者自述,他在省城师范学校读书时,《小说月报》是他最喜读的书籍之一。他在省立师范学校读书的时间是1921—1925年,此时许地山的《命命鸟》与《商人妇》等作品已在该刊发表。艾芜的成名作,也是他给人印象最深、最得早期时间考验的作品,是《南行记》以及《南行记》初版八篇之外其他南行题材的小说。艾芜1925年的离家远行,逃婚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使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更精彩。他最终选择经云南去缅甸,除了经济的考虑,恐怕对边地生活与异域风光的向往与好奇,也是重要因素。在普罗文学逐渐占据主流的1930年代,《南行记》首先以其特有的异域情调引起文坛注意。

虽然许地山小说也以异域情调著称,但《南行记》与许地山异域传奇小说在创作方法上有很大的区别:他不是用自己某种既定的人生哲学去启示、引导或安慰读者。对于这时的

艾芜：行走在他乡与故乡之间

□张建锋

艾芜三次南行,1925年、1961年、1981年,纵横半个多世纪,对漂泊的神往、对流浪的眷恋、对行人的渴望,是艾芜终生的情结。南行是艾芜人生最销魂的事,成为文学之根。因为南行,成就了南行记系列小说,以他乡情调为文坛关注。而故乡是挥之不去的,回望家园,描写岷沱流域,故乡小说以展现蜀地文化为特色。艾芜的艺术之旅就在他乡与故乡之间。

行走他乡的人生寻找

艾芜在《我的青年时代》中说到南行：“仿佛一只关久了的老鹰，要把牢笼的痛苦和耻辱全忘记掉，必须飞到更广阔、更遥远的天空去一样”，“才能抒吐胸中的一口闷气”。南行之前艾芜以诗明志：“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蜀山无奇处，吾去乘长风。”南行是艾芜为了摆脱单调沉闷、痛苦的主观选择。这就决定艾芜在“长风”吹拂下去寻找一个与蜀中“牢笼”式的生活根本不同的人生境界，以填补蜀中人生的缺陷。《南行记》开篇艾芜安排《人生哲学的一课》，绝不是随意的。南行是艾芜的大学，从中接受了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1943年，艾芜在《漂泊杂记》改版后文中自述到，他写漂泊生活，只写使他心神向往并感到留恋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山间刚刚冒起的玫瑰朝日，是抹着晨光红露的丰饶原野，是他带到新鲜地方的平坦旅途，是引起他高声呼啸的林中新鸟……因为这一切都使人感到自由而且快活。“自由而且快活”，也许就是南行之旅，艾芜寻找的人生境界。在《我的旅伴》中，抬滑杆的老汉、老朱对萍水相逢的“我”关心备至，时时处处替“我”着想，两颗金子般的心映照出世道的险恶与不平。正是这两位靠出卖体力谋生的人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留着他们性情中的纯金，作为我的财产，使我的精神生活，永远丰饶而又富裕。”滇缅边义的人际关系更接近原生态，简洁，单纯，讲义气，重然诺，慷慨豪爽，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热爱自由。艾芜将“文明世界”设置为背景，专注于描写在奇异的环境中为生存而挣扎的各色“粗人”、“野人”，挖掘他们在无望的挣扎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性，以及他们放浪于奇山异水的“自由”与“快活”。

艾尧对“自由”与“快活”的推崇，其实是对专制的社会秩序、对安分、顺从的国民性格、对分等级、明尊卑的儒家观念的否定。《南行记》描写的边地是一个众生平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等级秩序、身份系统被全部消解，人与人之间没有贵贱、尊卑、优劣、高低、贫富之分，所有的人都是兄弟、朋友，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生死、患难、甘苦大家一

纪”、“
坦荡、洒
自由自
品性。杨
荒”以自
驯的奇特
官家法度
严。”他

异域色彩与人生哲学

——艾芜与许地山的“对话”

□ 阎浩岗

艾芜来说，正确的人生哲学正处于探索寻求状态，他是在用自己的眼睛、头脑甚至脚板去发现并逐步获得的。而且，在漂泊生涯伊始，他并未准备终生从事文学创作。他本来是想通过半工半读，钻研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文学是他的业余爱好。在继续求学历无望的情况下，才选择了文学。他说自己那时“对文学的认识不足，以为这是无足轻重的，也不愿怎样苦苦地去研究”。直到后来有一次看电影，他“从此认清了文艺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原〈南行记〉序》。《艾芜文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朋友沙汀的鼓励劝勉下，才立志把文学当作自己终身的事业。而一旦确立志向，他对于文学事业就表现出自己的忠诚。在与沙汀联名给鲁迅的著名信件里，表示：“我们决定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我们应有的助力和贡献，并不是先生所说的那一辈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所以，在步入文坛之后，他虽然加入了左翼行列，却并未完全接受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模式，仍坚持对于人的独立思考与不断求索，他最早的作品一开始还因此而被左翼刊物退稿。他的南行题材的小说，便是这种求索的记录。

《南行记》在双重意义上是一本“在路上”的书：它写的是漂泊中的作者在由滇赴缅途中的所见所闻，同时也展示了作者对人生意义、人生哲学的探求历程。这种探求在这本小说集中用的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在写于1963年的《〈南行记〉后记》里，艾芜曾说：“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人生，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我写《南行记》第一篇的时候，所以标题就是《人生哲学的一课》。”这些南行作品共同关注的焦点，是那些对于当时的流社会来说处于边缘地位的各种化外之民、法外之民的独特生存状态与人生哲学。其中，有几篇主要表现作者自身经历的，如《人生哲学的一课》《在茅草地》，它们表现作者本人探寻人生真谛的身心历程；给人印象更深的，是那些重点展示边地特殊职业人物生存状态及其人生哲学的小说，最典型的如《快活的人》《荒山上》《月夜》《森林中》《山峡中》《我的旅伴》《山中送客记》《偷马贼》《私烟贩子》《寸大哥》《我们的友人》等。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写法外之民生活的有《水浒传》。在艾芜之前的中国现代小说中，穆时英的《南北极》写的法外之民远不如艾芜南行小说中的人物那么亲切、真切、细腻，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虽多是化外之民，但主要还不是法外特殊职业者。是艾芜小说中那么多贴近地让我们了解了那些人的生存状态，并真实可信地揭示了其内心世界。

《荒山上》与《私烟贩子》的主人公，信奉的是冒险者的哲学。前者写一个很讲道义的强盗。他很坦率地对“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你只看见那些乡巴佬，一天就是吃饭

因觉做活路。其实呢，世上上倒有好些人总想古里八怪地过日子，愿意碰见许多料不到的事情。就是突然有人打背后捏脖子，也比整天打呵欠活下去安逸些！”《私烟贩子》中，陈老头，也道出了冒险生涯的乐趣。他对比喜欢乱奔乱跳的马和老实的牛的不同待遇，还讲述自己远私烟过关时的心计与其中的乐趣。他对朋友讲义气，舍不得钱去探望狱中的同伴，认清了“钱这种东西，你攒它做啥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不但以自己所干的行当为耻，反认为：“倒是你恭恭我是卖私烟的陈大善人，捧我是做过县长的陈大老爷。我可要羞得钻狗洞了！”《山峡中》的老头子，讲的是强者哲学：“要是心肠软一点，还活得到今天吗？……在这里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偷马贼》中的老三因做贼而被打，他不但不能推，还惟恐别人不知道，因为职业偷马贼在这都受到某种程度的敬畏。他总结出的是“钻裂缝”的哲学。既然这世界没有给他们这种人留下容身之地，那么他就要找世界的裂缝，坚决地钻进去，还要把这裂缝“捶得更些，更宽些！”而《快活的人》里的老三爸的生存哲学是：快主动、不断适应变化着的形势，乐天知命。

虽然又芜笔下这些人多是土匪、强盗、小偷，许地山下的惜言、尚洁和春桃等是良家妇女、贤妻良母，但他们有其共同点，就是顽强坚韧地活下去的生存意志以及随遇而安的心理调节能力。这可以看作艾芜在与许地山对话时对于某些方面的认同，可以看出二者的共识之处。然而，作为后起的作家，面对“影响的焦虑”，颠覆和反叛是他们寻求创新的主要方式。艾芜《南行记》与许地山《缀网劳蛛》所表现生存哲学的最大不同，就是一个是主动进取，一个是被动适应。

作者在作品中关注和表现的焦点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作家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他的人生哲学及其探索与思考的过程。我们知道，艾芜在漂泊中屡屡落人生计维艰、食不果腹之地，并非完全由于被迫。漂泊是他的主动选择，作为青年的人，他不甘寂寞，不愿被束缚在故乡偏僻角落过平庸生活。想要在漂泊流浪中开阔视野，认识世界，让自己的生命活力得到尽情释放，满足自己本性当中探索和冒险、追求生命自由境界的需要。艾芜在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曾透露出他选择漂泊的心理动因。小说《玛米》写于1962年，写的是一个漂亮少女对“我”的暗恋。小说写“我”没有接受她的爱情，是因为“我不想太早就结婚，要像鸟子一样，飞得更高，飞得远，不应该自己把一个石头吊在脚上。我离家出走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丢弃了那个可能吊在我身上的东西。”这虽只是小说，但里面的“我”应该说是和作者非常接近的，甚至这篇也可以看作作者的自传（张效民的《艾芜评传》就把它作为史实写了进去）。艾芜以其他人物为主人公的南行

沱流域的新繁老家隔得不远了，心情，油然而生，刘老九及其周围像梦似的显现出来。艾芜得到父后，提笔把两年前在桂林开了头的长篇《落花时节》一气呵成了。对于他是他的“精神导师”，恩重如山。当父亲的学生，接受了父亲的言传后，他执意南行，20年没有回家！部凝聚在父亲、母亲的身上。艾芜和故乡的情感纽带割断了，千丝万缕，催生了怀乡之作《落花时节》系列作品中情感最真挚，思想最的幼年时代》。艾芜以小孩子的笔情来叙述，汤氏家族移民的苦难史、家族的盛衰史、川西坝子秀丽的乡风民俗、童年的生活趣事

精神还乡

十年之后,曾经写信给十年未归,才能转回家。艾芜没有如约归家,还欠功夫。虽然这样决定有静息下来。于是,便乡的景色人物,移到纸面开始书写回望中的岷

追求新的人生境界的思想、情感倾向。列作品钟情于描写故乡的山水人物，对故土充满深情和眷恋，反映了艾芜后精神还乡的心路历程。

他乡与故乡之间的国民性思考

总是浮现眼前深深地像版后记)中艾芜深情地回忆,对我是有着最愉快风和,家家妇女都到田里,祖父却要我在半暗半那种闷气,真是令人难些鸭子,常常放在小河每天上午叫我出去看一本书(经)或者讨厌的野的花,开发花枝,又展学树林中的小鸟一般,痴情其实是精神还乡乡村,从小就清流一带游玩,上学赶下的乡风民俗曾经让他,举目都是异乡风情,缅甸仰光艾芜写下诗滴落在异国的湖上。/但墓旁:冷寂的幽夜慈母好凄凉;/芳春慈母尚徬徨。/回首国的湖上。”人在异国,乡。事过境迁,漂泊不上心头。《春天》之前的乡风俗记》。艾芜似乎行走他乡,回望故乡,空间的艾芜思考国民性问题。在南行过研究人,并形成了习惯。他在《缅甸象》中说:“我到—个地方,总爱研性情的,而且把先前接触过的人较,竟出他们的差来。”在这篇述到,在一次由钦坎山脚的小田中,缅甸司机被林间的蝉声打动了子,跳到路旁林,兴致勃勃地享受曼德里、仰光,街巷之间闲逛的缅甸一面唱一面拍手;乘坐公共汽车上窗上伸出手来拍打着,喧哗喊叫颇为感慨:“我觉得缅甸人是要比些孩子那样好戏的脾气,颇带些国人呢,总是庄重的、沉静的。即刻,像过日历新年,还是没有放怀的狂妄,反而弄得衣冠楚楚,文绉绉南洋回国后,艾芜还是这样的感来,就常常觉得周遭一切,太沉闷年轻少壮的血,总须得打上一句《沈从文论》中说,沈从文“想借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族身体里去,使它兴奋起来,年暮世纪舞台上,别个民族争生存权一样,艾芜也借文学给国民‘输血’

忆里，连家乡风俗的细
的记述正体现出艾芜
的。父亲却在 1945 年病
南温泉乡下，和在岷
真滇荒野山区是离儒家文化
方，在那里存在着纯正的蛮性和野
时代大潮冲击圈外，边地人处于边
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了生存权利，成为“野人”，复归到

说，也屡屡表达了类似的人生观。读了这类作品，读者可以感到，作者对那些喜欢冒险、勇于反叛者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哲学，基本持同情甚至赞赏的态度。有时候，作者就借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七指人》里的清和尚说：“你想个年轻轻的小伙子，怎能老闷在家里，不死不活地过下去呢？”《偷马贼》里的老三对“我”劝告：“老弟，老蹲在一个地方，会发霉呀！去找找裂缝吧！”《寸大哥》里的主人公也说：“我做客做够了，多蹲下去会生病的！”这类作品还突出表现了这些冒险者生活中独有的乐趣。那位初学冒险偷马被打的老三，并不感到悲伤痛苦，“在他身上升腾起了强烈的单生存欢乐感情，是用不着任何人的怜悯的”。私烟贩子陈老头充分享受冒险生涯紧张后的刺激与欢乐，他说：“你——做，你就觉得那里面味道大得很，酸甜苦辣，样样都有！”他还对别人描述冒险途中景色怎样美，萤火虫如何好看，丝毫并不为自己将来的病与死担忧。寸大哥由于脚伤不能再赶马了，但他无比怀念赶马生活中篝火旁野营与同伴间互相唱和的趣味，还说：“我们一群赶马人的快乐，你是想都想不到的。”

不仅对于既存的国家法律和道德体系，即使相对于1930年代及其以后以社会批判姿态出现的左翼意识形态话语来说，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异端色彩。起码它不是规范的“普罗”话语，甚至也不同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表现下层民众生活的“血与泪的文学”，我们当然也可以从中搜寻出某些反阶级压迫或反帝文学，比如有些篇章描写了旅店老板对雇工的剥削利用，缅甸的英国殖民者对当地汉族老板和傣族妇女的盘剥或侮辱。但南行系列小说中成就最高、给人印象最深的那些作品，其主旨却不在此，而在于表现某种生存哲学，肯定生命力的张扬。《七指人》实际表现的就是自然生命力的不可遏止。另外，被郭沫若称颂的《松岭上》结尾处关于“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更年轻的一代的人的身上的”的观点，是对中国封建社会以来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反叛；作者为自我实现而离开父母远行，甚至20多年不回家探视，正与上述观点相关。

这些南行题材小说虽然主要以作者亲身经历为依据，并没有虚构理想人物，但大多数论者仍认为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是因作者选材的独特奇诡，二是因作者并非客观冷静地讲述，而是将自己的倾向旗帜鲜明地表现在作品中，如他自己所说：“我也并不是平平静静着手写，而是尽量发抒我的爱恨，痛苦和悲愤的。”（《南行记·后记》）他对于那些冒险哲学、强者哲学、“钻缝子”哲学持理解同情态度，但在小说中明确表示并不完全赞同：他终于没有去贩私烟，也不惯老头子、野猫子们的残酷，认为跟随他们“并不是另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他更没有去做偷马贼。虽然他人生哲学的第一课学的是人必须先吃饱肚子，处世需要奋斗，但他向往和追求的是真正的光明，不是苟且偷生。对于寸寸大哥，作者同情的成分似乎更多些；尽管他不愿屈居一处，但决不为赚钱多而贩鸦片，也不去盗马，因为他不肯与过去的伙伴们为难。不过，对胡三爷式的快活乐观，作者既有肯定，更表示出怀疑，结尾安排了他的横死，批评他“活得糊里糊涂”。其实，胡三爷的遭遇与安哲学，未尝不和许地山笔下的尚洁惜春蜜桃们有些相似。只是青年艾芜始终持积极进取、崇尚反抗的人生态度，使他不可能接受这种哲学。《快活的人》可以看作与许地山小说宣示的人生哲学的种对话，或是对于许作的艾芜式回答。

又无一辈子都有一种漂泊情结，这反映出他对于人生的探索，始终处于进行时态。

故乡的生命形态完全展现，成为反抗强权、野性不驯、蛮性十足的人物。(山中送客记)中的偷马贼大老杨唱道：“说荒唐来就荒唐，/不纳税也不完粮。/碰着官儿还要打他的耳光！/呵呵，到处都是我们的天堂！/呵呵，到处都是我们的家乡！”边地女性不守“温柔敦厚”的规范和“三从四德”的礼教，不受约束，不安本分，叛逆、倔强、泼辣、坚韧。这正是古老民族过于“儒化”的人们所缺乏的。(《山峡中》)中的野猫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是“狼奶”喂养出来的。她自小与“匪首”父亲魏大爷“在刀子上上过日子”，学会了做强盗的本领。她的身上体现出未被“文明”污染的原始的蛮性、野性、天真和快乐。姜大嫂(《芭蕉谷》)、周四嫂(《一个女人的悲剧》)与祥林嫂(鲁迅《祝福》)、单四嫂子(鲁迅《明天》)、文嫂(柔石《二月》)、春宝娘(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的命运迥异，思想、性格却截然不同。江南嫂子虽不知“书”却极为识“礼”，身上留有儒家礼法的烙印，思想、性格上患有先天性缺“钙”症，始终软弱，无力反抗。祥林嫂、文嫂都是被“守节”的礼教吃掉的。芭蕉谷的姜大嫂就不同了。她年轻时被田主奸污了，没有去跳井跳湖做烈女，却和田主逃到边地来，照样生活。瘟疫夺走了丈夫的生命，她和单四嫂子、祥林嫂、文嫂一样，都成了寡妇。她却以寡妇身份当起了旅店老板，不信“三从四德”，没有“从一而终”，而是再嫁三次。当她的女儿被奸污了，她开导女儿：“不要紧的，你心里去开些！妈做女儿的时候，也遭遇过这样的事呀。……你看，我现在不还是活出来了？听我说话，丢些个，有娘一块，你不愁没好日子了。”儒家文化稀薄的边地孕育出姜大嫂的“另类”品性。

艾芜是从自身的流浪经历、感受、体验中获得的启示,展开国民性思考的,烙印上了深深的边地生活原色。在艾芜这里,边地异域的生活景象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本土文化的原形和老态。作为一个羁旅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之中的流浪汉,艾芜自然地由本土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出发,并以之为参照系、坐标,来同异质文化进行比较。在两者比较中,艾芜探求自己的理想,寻找救治民族痼疾的药方。由此,艾芜冷静地剖析本土文化的种种缺陷与不足,在对比中寻求异质文化富有活力的新因素。缅甸人新春庆祝水节的欢乐对比与中国旧历新年的庄重沉静形成鲜明的对比;艾芜始终觉得国内生活太古老,太沉闷,需要注入“年轻强壮的血液”。在《八莫那城市》中,艾芜感慨地说,一旦踏进异国的城市,怀疑是对不见的东西感到诧异,随后就开始怀疑并抛弃自家一些牢不可破的观念。比如中国人认为雄鸡在傍晚昏夜叫唤,便是不吉利,但一到八莫就完全摧毁了,因为那里的鸡,既不同雇,入夜还高声乱啼,是寻常至极的事情。“八莫给人以怀疑本国传统观念的精神,实是很丰富而又极其炎热的。”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日常生活现象,经过艾芜的跨国界对比、跨文化思考,不再是两种习俗、风情的描绘,而是具有了理性的色彩。艾芜的思考让人想起鲁迅《论照相之类》《忽然想到·五》等杂文以及《狂人日记》等小说。不过,鲁迅是从家族制度和礼教的角度来剖析和思考国民性弱点的,具有一般作家的不易达到的深刻性和尖锐性。而艾芜侧重从普通农民、乡间农民生活现象入手,在与其乡的对比中来剖析和思考,自有其独特的价值。